

马克思主义视域内数字传播的挑战与创新^{*}

李 燕

摘 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数字传播的变革与创新主要取决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但其背后隐藏着意识形态主体的作用，特别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符号剥削。数字传播的中介变革体现着主体本质力量的进步与发展，但同时也伴随着符号异化现象加剧等各种挑战和问题。只有不断推进媒介融合与创新，才能走出数字传播过程中遇到的困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数字传播，媒介融合，媒介创新

The Challenge and Innovation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Li Ya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mainly depen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owever, underlying this development is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subjects, especially the exploitation of signs driven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The reform of media in digital communication reflects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s essential power. At the same time, this reform is accompanied by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such a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alienation of signs. Only by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media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 本文为武汉理工大学2023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融入思政课程教学的多重进路”(W2023146)中期成果。

can we escape the dilemma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Marxism, digital communication, media convergence, media innovation

DOI: 10.13760/b.cnki.sam.202402003

信息科技革命是导致传统信息传播颠覆性变局的核心因素。我们经常以媒介的不同形态来讲述“传播”，比如报纸传播、网络传播等，实际上是默认了“中介”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数字时代，“技术决定论”“技术意识形态论”和“技术工具论”等论调复现，凸显了“中介-数字”在信息传播中的载体和渠道功能已经扩张到深刻影响信息的具体内容和社会功能，“中介”越来越具有本体论的意义。由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在信息传播领域中的广泛运用，愈益引发人们的焦虑：数字传播主体在未来是否依然由人类主宰？数字传播是否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发展方向？数字传播领域的结构性失业在何种程度上威胁个体的生存？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既追本溯源又考察信息科技革命和数字传播最新样态，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展望未来。

一、多维视野中的信息科技革命和数字传播

信息科技革命是关于信息的技术革命，即信息中介革命，其引发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信息科技革命是导致传统大众话语传播颠覆性变局的重要因素，由此信息传播进入数字传播时代。围绕信息技术与话语主体、信息技术与话语接受以及信息技术与话语表现形式和话语传播渠道，学界众说纷纭，业界也在不断探索。大体来说，人们关于数字传播发展前景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技术决定论者认为信息科技革命是信息传播革命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未来数字传播的深度、广度和效度主要取决于信息科技的进步。信息科技革命仍然在更新迭代，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很多学者认定信息科技革命是现在和未来数字传播的决定性因素。实质上，这种看法是历史上“技术决定论”在信息科技革命浪潮中的时代翻版。较为极端的代表人物是麦克卢汉，麦氏关于媒介即信息的论断非局限于传播事业，他还重点论述了媒介技术进步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甚至提出要按照媒介形态来划分社会形

态。数字时代,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推荐、智能分发等,使信息传播发生了史无前例、令人瞠目结舌的重大变化,虚拟仿真将消除物理意义的空间、时间,不同时空维度的人们甚至可以获得超越真实的交流体验,媒介融合和媒介创新将构筑一个外在于自然世界的虚拟世界“元宇宙”。以上,引发人们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两种态度:技术统治人类,技术使人类完全解放。悲观论者认为“元宇宙”对于人类具有很大的本体论意义。国外有学者指出,“生物技术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融合之后,大数据算法有可能比我更能监测和理解我的感受,而掌控一切的权威也可能从人类手中转移到计算机手中”(赫拉利,2017,p.45)。由此,“人们失去了自由意志,失去了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力”(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2013,p.206)。乐观论者则相反,认为每个人会获得最适合个人发展和最符合个人兴趣的信息或知识服务,传播进入理想状态。百度李彦宏(2017,pp.35-37)的态度颇有趣味,“智能革命是对生产、生活方式的良性革命,也是对我们思维方式的革命”,“人工智能的历史使命:让人类知道更多,做到更多,体验更多”。这种观点跨界代表了行业和学界的一种态度。需要指出,技术决定论者往往搁置意识形态,崇尚科学。

第二,从技术意识形态批判视角来看,信息科技革命隐藏着意识形态,人们被深度操控。马克思关于现代技术造成主体性丧失的批判理论,启发了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当代追随者的技术意识形态批判。如英国哲学家罗斯·阿比奈特(2011,p.24)所述,“在这个工具理性的概念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与马克思对资本和技术之间关系的理解不一致的”。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论”看到了现代技术齐一化、同质化对主体个性的压制。马尔库塞则直接提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技术趋向于变成极权主义的工具,具有隐形的奴役、操纵和政治控制功能,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实现:一是刺激消费和满足消费欲望,以此实现人们对现存社会制度的认同,消解批判和反抗;二是科学技术全面渗透、介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工具理性的外在尺度被普遍认可,社会生活世俗化、物质化。“在技术面纱的背后,在民主政治面纱的背后,显现出了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在作预先规定的自由选择时的沦丧。”(马尔库塞等,1982,p.90)哈贝马斯指出科学与技术结合为第一生产力,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隐形意识形态统治工具,使“生活世界殖民化”,人的主体的交往理性屈服于冷冰冰的工具理性。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2004,p.8)尖锐地批判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富媒体,穷民主”的悖论,揭穿了美国宣称大众传媒“第四权力”的虚妄,揭露出媒体运用巨

大财力影响了政治决策，资本、技术与政治高度合谋，特别是在“新科技光芒夺目、电子术语晦涩难懂的背后，媒介体系已经逐渐集中到少数联合公司手中”，信息技术沦为资本极权政治工具。信息技术背后隐藏的资本逻辑造成网络文化的碎片化、肤浅化和批量复制，人工智能传播造成个人隐私数据泄露、个体被监控，从而深度陷入不自由、不自主状态，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等都被纳入信息技术管理之中，并且“千人千面”的智能传播威胁到公共话语的传播，社会有极化、原子化的危险。技术意识形态论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做了深刻的批判，但其片面性在于只是从抽象的人性和工具理性的对立展开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理性统治具有科学的调适能力，还提出了“play-work”等概念，美化、幻化“数字劳工”和普罗大众的生存和生活状态。

第三，传媒政治经济学派揭示了信息资本的当代剥削实质，指出西方自由主义运用财力操控信息科技进而操控政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技术意识形态切入的视角不同，传媒政治经济学派则承袭了马克思关于机器大生产和分工如何剥削工人以及技术与资本、政权如何关联的理论，揭示了现代媒介技术的资本异化和表面的民主、富足生活背后隐藏着的与媒介技术紧密相关的新型阶级剥削和奴役，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美国批判传播学者丹·席勒援引马克思《资本论》等经典，阐述了资本化的网络技术在当代重组劳动过程与内容，并且在已经重建了的商链中寻求更新更适合的工业管理、空间布置以及生产管理程序；达拉斯·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发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受众使用是传媒实现自身资本复制的关键，不仅是劳动，而且受众的注意力和闲暇时间也被转化为商品。罗伯特·普雷援引空间批判理论，认为媒体/网络资本家创造了媒体/网络空间，然后出租给广告商，以租金形式占有了部分剩余价值。“受众商品”“非物质劳动”和“知识劳工”等一系列新概念，显示出学者们对围绕新媒介技术座驾而形成的对新的生产关系的思考。传媒政治经济学派还指出，媒介化社会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边界已经不再分明，媒介技术既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因素（赵月枝，2018）。赫伯特·席勒和丹·席勒父子、C. 赖特·米尔斯以及罗伯特·W. 麦克切斯尼等几位美国学者，把数字网络置于漫长且复杂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进行考察，他们深刻指出，自由市场和商业化决定了媒介技术只可能代表少数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甚至加剧了经济危机和政治不平等以及军事上扩军备战的危险。

这些学者大胆地触及私有财产制和国家制度本身，并且在不触动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小心谨慎地提出要有公共资金以保留一部分公共媒介。但即使

这样,他们也被长期边缘化。相较于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意识形态批判,传媒政治经济学派展示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残酷真相,但遗憾的是,其批判的作用远远大于建设性,影响的范围还很有限。总体而言,上述批判都为我们审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息技术和信息传播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马克思主义视域内的媒介话语传播技术中介变革与挑战

马克思认为,科技革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是人们经由异化走向人类社会解放的历史必然。信息科技革命推动了信息传播的历史进程,促进了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马克思非常鲜明地指出,技术发展与人的本质力量展现是同一有机体的同一发展过程,技术以及与之连成一体的工业历史和工业所带来的存在物“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有用性这种外在关系来理解”(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a, p. 192)。马克思拒绝从外在有用性关系来看待技术,他认为技术是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人本质力量的展现;劳动(技术)创造了人,人和人类社会在劳动(技术)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的精神观念也在技术的发展进程中形成和不断丰富,“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共中央编译局,2012, p. 423)。马克思同时认为,技术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器大生产和分工使全世界卷入到资本主义大生产中,从而引起生产力和人们交往方式、交往范围的变化,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数字传播技术融合印刷、音频和视频等多种手段为一体,丰富了人类的表达能力,增强了人类的感知能力,促进了人类思维和认识能力的发展,其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 交往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全球化。VR、AR等模拟现实和生物仿真技术制造的“元宇宙”,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交往的时空障碍,使所有场景如置眼前,如同“回归”村落的交往和传播——地球村落内“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和人际交往。(2) 网络促使“群众传播”真正实现,推动政治文明。用户自主传播和互动传播使人类进入真正的“群众传播”时代,传播主体、客体之间关系趋于平等,传媒机制发生深刻变化;网络舆论监督推动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民声、民情,政务公开、透明,加速了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3) 网络传播推动文化创新。无数用户相互联结、沟通和交流,自主学习自主创新生产内容,必将使人的本质力量空前展现,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必将迎来高度繁荣。(4) 新数字传播技术使传媒事业更加显示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新数字传播技术蕴藏着无限的传媒产能,带来影视行业巨大变动,网络传播无远弗届、随时随地,必将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然而,信息科技革命也带来新的异化,引发人们关于信息科技革命和数字传播发展前景的种种焦虑担忧。这些焦虑担忧普遍表现为人们只是从话语传播的工具性方面去做出理解。之所以产生技术外在于人、控制和危害人类的感觉,是因为异化劳动普遍存在,异化劳动使人的对象性活动转化成对主体的压制,反过来,人对于本来应该是主体本质力量展现的劳动(技术)只能从工具性来认识。异化劳动形成了一种悖论: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不断扩大人化的自然,使自然处处打上人的烙印,但“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马克思看到了劳动(技术),哪怕是异化劳动(技术),与人和社会的关系:自然科学和工业构成“真正人的生活基础”和解放基础,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存在,并且使人的非人化充分发展;人类以科学和工业为媒介,使自然界成为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海德格尔(1996, p. 885)用“座驾”打比方,“我在技术之中,也即在其本质之中,发现人处于某种势力支配下,迫使人应对它的挑战,面对这种势力,人并不自由”。他直白地讲述了现代技术对置身于技术座驾中的人和自然的破坏式奴役与掠夺,这其实就是资本化的技术对人和自然造成的深度异化。信息科技革命使公司重组打破了工厂与产地、办公室与实验室之间正常的合作生产流程,实现了生产力的空前增长,并且迅速地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纳入互联网视野,互联网成为崭新的资本角逐场。从2020年起,以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塞德里克·杜朗、约迪·迪恩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指出资本主义正在消亡,被一个政治上相对退步的形态取代——技术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是基于云平台的崭新资本主义形态,它在传统的商品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基础上,提出了资本的三重性,认为资本的占有代表一种合法的剥削权力以及在云资本下矫正和引导用户行为的权力。

因此,为合理推进信息科技革命和数字传播的发展,必须先要认识清楚资本逻辑下信息科技革命造成的受众商品、文化阉割和数字劳工劳动以各种形式被占有、剥削等最新异化处境。首先,数字传播操控受众,使受众成为数字产品运营商的销售对象。网络游戏、短视频等是最为普及、最为典型的数字市场高利润产品,也最能展示人的异化处境。各种仿真技术和数字编码

□ 符号与传媒 (29)

打造出仿真、玄幻、震撼的虚拟景观，新、异、奇、快，召唤出虚拟的价值欲望，以瞬间满足感替代现实生活中的庸常和忍耐，替代现实生活中长期、系统、艰苦、复杂的脑力劳动，使人掉入动物本能的冲动和欲望陷阱中，甚至成瘾，形成精神疾患。

其次，数字传播技术创新直接服务商品广告和商品销售。平台资本以技术垄断强制占有和窃取用户隐私数据，违背市场自由、平等原则，损害消费者权益。智能终端分析受众的文化倾向、性格特征、商品偏好、购买能力、日常起居等，据此生成商品智能推送，量身打造商品广告。实际上，所谓分众传播、差异化传播，“个人日报”“千人千面”等，其目的是流量和商品销售，而不是用信息科技和数字传播为用户的自我成长赋能。另外，各种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出售搜索词、定点商家导向等，使资本利益最大化，却严重损害了公民知情权和市场选择权，损害了市场的健康发展，最终危害到技术自身的合理存在。

再次，数字传播技术为服从大众市场，往往阉割文化创新，狙击文化经典，“信息茧房”“信息囚徒”等也阻碍了文化多元交流。网络产品看似丰富多样，实质都内含着短视频的传播逻辑。有趣简短、触屏刷新、洗脑神曲、特效滤镜等，不停歇的新鲜刺激迎合大众市场，碎片化、肤浅化和病毒式复制传播，以最短路径实现商业利益最大，这就难免会牺牲文化创新的丰富性、多样性。而算法推荐一方面倾向大众、流行、娱乐，另一方面造成数字传播内容单一、信息渠道窄化等“信息茧房”“信息囚徒”现象，这些都深度阻碍了文化创新。在被算法控制的世界中，人们日益失去了自主自觉的活动能力，“算法变成了黑箱，世界迷失在神经网络的深层层面中，而人无法进入这些层面”（韩炳哲，2023，p. 10）。

最后，各大媒介平台企图以非雇佣的形式占有用户劳动并控制用户，打造数字时代的资本帝国。资本逻辑企图凭借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打造“人类超越生物学”的数字世界，脑机接口等技术被用于以数据营造精神王国。（库兹韦尔，2011）这种对未来社会的数字想象，从语言的幻术层面来说，营造了人类不灭的神话，实质是资本解构虚拟世界的贪婪野心。回观当下，触目惊心的是平台正在以各种策略增强用户黏性，占有用户时间和用户劳动，潜藏着数字资本企图征服整个世界的危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数字——流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数字劳动也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即从产业生产关系下的资本家－工人的雇佣劳动关系变成平台－用户的不稳定的赢者通吃型的生产关系……”（蓝江，2024）

概而言之，信息科技革命对传媒事业、社会生产力有巨大促进作用，但也潜藏着很大的破坏作用。目前，这场技术革命还在人们的巨大憧憬和各种意图的努力探索中，向着谁也无法清晰预知的方向前进，由此引发人们的担心：人工智能是否会超出人类的控制？人类是否会因为技术的智能化而退化？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的人类鸿沟会造成什么样的动荡？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导向就是要聚焦信息科技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事关生产力和民生福祉的重大问题。

三、数字传媒时代的媒介融合与媒介创新

辩证唯物主义视域内，“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概念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目标，实质是生产力（科技）和生产关系的全面创新发展，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在信息科技革命中的全新发展。媒介融合本质上要求调动一切力量，推动信息科技革命高速发展，使以大数据为根基的新质生产力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实现社会交往突破物理时空局限，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媒介融合有一个历史过程，并有自身的逻辑。媒介融合最初是在技术语境中展开的。20世纪70年代中叶，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相继发展，有专家尝试提出二者的聚合。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尼古拉·尼葛洛庞帝用图例展示了融合的思想：三个交叉的圆环趋于重合，三个圆环分别代表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业和广播电影工业。这种技术融合的思想展现了未来技术的发展愿景，资本很快从中嗅到了商业气息，为其提供了大量赞助。传播学者伊契尔·索勒·普尔于1983年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the convergence of modes），指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导致了传播形态的聚合。到世纪之交，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业界的一个重要投资方向和学界研究热点，推动了生产力巨大发展和社会深刻变化。媒介融合涉及媒介传播、出版印刷、信息通信和电子制造等多个产业，这提出了新的人才需求，波及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的改革调整，同时，生产组织结构也需要相应发生分化、重组，打破传统的产业、行业之间的壁垒。媒介融合促使各国纷纷制定、出台或修改媒介传播、印刷出版及电信等相关法规政策。媒介融合还对原有的商业体系和服务产业结构等都提出了要求，“协商模式”“合作分类”“联合操作”等作为生产实践要求和社会理念，深刻影响了社会发展，创新性思维成为技术大变革时代的普遍要求。

从媒介融合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内涵和外延已经扩大:媒介融合是多学科多领域的科技融合创新,是信息科技革命与人类社会的高度融合,是人的思维和认知习惯的创新。首先,媒介融合是技术层面的融合创新。媒介融合既指综合使用不同媒介、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又指多媒融合发生新的质变,形成全新的媒介形态,后者的意义更为重要。媒介融合是遵循技术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长期动态过程,是不间断的探索和创新。简而言之,媒介融合必须着眼于未来,其底层逻辑不是新技术和旧产业的生硬嫁接,而是要创造新质生产力和新时代。就像蒸汽机推动产生工业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推动产生了又一个新的时代——数字时代,人们的话语体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产等都被“数字结构化”。

其次,媒介融合是主体和价值层面的创新。媒介融合是技术与主体、与社会的深度融合。技术创新构成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部分,体现不同主体的意识形态,影响到组织架构和人际交往性质。数字传播技术创新理念必然地包含对媒介融合价值归宿的思考,即“为了谁”。习近平总书记(2023a, p. 86)指出“媒体融合是一场自我革命”,“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不同于为了资本增殖的媒介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传播为克服技术的资本化,就要确保信息科技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必须科学认识网络新技术,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变量成为社会主义传媒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还要做好顶层设计,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

再次,媒介融合是人的思维和认知习惯的创新,是数字时代的数字传播。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是语言习惯、语言表达、认知心理和接受方式等各方面的变革。在媒介融合的多年实践中,人们战胜的第一个典型思维误区是新媒介占据技术优势,传统媒体恪守“内容为王”,技术和内容简单相加。实质上,数字传播既不是技术和内容的相加,也不是看似更进步的“相融”。数字时代的内容体现着崭新的时代,时代是新时代,内容是新内容,新内容蕴含着新科技和新科技背景中的新的社会。“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b, p. 34)《共产党宣言》里的这段话不断被征引,这警醒人们,抱残守缺必然被淘汰,好的内容需要有创新思维和新时代的认知习惯,数字传播是数字时代的全面反映,旧时代的传承必须

经历新时代的创化。

最后，媒介融合必然包含平台、渠道、体制、机制等各方面的创新，是每个人和社会整体的全部进步。媒介融合改变了内容的生产模式与传播模式，原来不同类型媒介的独立经营模式转向多媒介联合经营，形成了崭新的融合传播，构建多媒体、多渠道立体传播媒介话语。传媒业态的颠覆性变局暴露出传统媒体对新媒体传播事业的隔阂，职业媒体人的部分角色正在被各行各业的自媒体人取代。结构性失业加速迭代，必然引起人们对新技术的恐慌，这种“本领恐慌”就像工业革命初期工人捣毁机器一样，没有认识到机器（技术）背后的落后生产方式才是人的发展的最大威胁。媒介融合要求改革创新管理机制，不同传媒组织之间需要协同合作，或解体分化与组合创新，打破原有的行业、职业分工体系，逐渐形成职业化、专业化和社会化联合写作的全民传播模式。人工智能传播正全面体现着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人们被信息裹挟异化，另一方面人类解放的进程又高度推进。

结 语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历史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现实中生产方式的变革，信息科技革命引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变化，开辟了数字传播时代。习近平总书记（2023b，p. 68）指出，要“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充分审视信息科技革命和数字传播在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以及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着眼宏观战略部署，积极落实微观建设，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社会主义公民建设的高度，努力推进信息科技革命。马克思（2009c，p. 338）曾对报纸的技术基础即印刷术做过评价：“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国家正在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各项产业深度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信息技术的人文主义发展倾向，保障传播话语权真正掌握在人民大众手中，全面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解放。

□ 符号与传媒 (29)

引用文献:

- 阿比奈特, 罗斯 (2011). 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 (王维先等,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海德格尔 (1996). 海德格尔选集 (下卷) (孙周兴, 译).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 韩炳哲 (2023). 非物: 生活世界的变革 (谢晓川, 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 赫拉利, 尤瓦尔 (2017). 今日简史: 人类命运大议题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 库兹韦尔, 雷 (2011). 奇点临近 (董振华, 李庆诚,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 蓝江 (2024).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彦宏 (2017). 智能革命.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 马尔库塞, 赫伯特等 (1982).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 (任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迈尔-舍恩伯格, 维克托 & 库克耶, 肯尼思 (2013). 大数据时代: 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盛杨燕, 周涛,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麦克切斯尼, 罗伯特 (2004). 富媒体 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 (谢岳,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习近平 (2023a).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习近平 (2023b).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概论.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赵月枝 (2018). 马克思归来: 网络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1-13.
- 中共中央编译局 (2009a).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编译局 (2009b).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编译局 (2009c).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编译局 (2012). 列宁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燕,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原理与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

Author:

Li Y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main research fields include Marxist principles and Marxist semiotics.

Email: hwyfe@163.com